

站内公告

基地概况

- 基地简介
- 研究方向
- 组织机构
- 规章制度

佛山非遗



- 非遗项目
- 非遗传承人
- 非遗保护

图览非遗



友情链接

- ▣ 广东省教育厅科研处
- ▣ 佛山图书馆
- ▣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图书馆
- ▣ 佛山市博物馆 [【更多链接...】](#)

学界视野

佛山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

作者：陈恩维 时间：2012-5-15 已被浏览 792 次

摘要：本文运用数量统计方法和人文地理学理论，考察佛山文化在广府以及岭南文化中的地位，认为佛山乃岭南的衣冠之数、文献之邦、风情之乡、辐辏之地，居岭南文化的中心地位。佛山文化之兴盛，取决于佛山地域环境、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

关键词：佛山 历史文化资源 岭南文化

佛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佛山原名季华乡，其形成的准确的时间已不可考。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记载：“佛山向名季华乡，不知始自何时，至唐贞观二年，居人见塔坡岗夜则有光，因掘地得铜佛三，奉于经堂，即塔坡寺，遂以佛山名乡。”[]相传东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剌宾国（现克什米尔）的三藏法师达昆耶舍尊者航海东来，在南海郡季华乡建寺传授佛教。嗣后，随着时间推移，寺宇倒塌。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乡人在塔坡岗上掘地，得铜佛三尊和刻有“佛山”二字的石碑一方（现存祖庙内），遂在此重建佛寺，并把季华乡改名为佛山。佛山有一句传统谚语：“未有佛山，先有塔坡”，反映的就是这段历史。

不过，佛山的历史，远远早于其得名。根据近年来在佛山发现的多处贝丘遗址和山岗遗址可以推知，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百越先民们就在佛山这片气候温和的沃土上过着渔猎和采集生活。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命任嚣、赵佗平越，并设南海、桂林、象三郡，佛山地域为南海郡番禺县。此后，虽历经朝代变迁，但在隋以前，佛山为番禺县所辖，此后直到民国，佛山为南海县所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1年1月12日设立佛山市（指现城区）；1958年设立佛山专区，辖佛山、江门、石岐3市和中山等13县；1970年佛山专区更名为佛山地区，辖14个县（市）；1983年6月开始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辖城区、石湾区两个区和南海市、顺德市、三水市、高明市四个市。2002年1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佛山市实行区划调整，现辖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三水区、高明区五个区。

1994年，佛山经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广东省6个获得此项殊荣的城市之一。此后，佛山市历届政府均据此把建设文化名城作为佛山的城市发展战略之一。那么，佛山究竟有哪些文化资源呢？文化名城因何而有名呢？本文拟摒弃印象式的描述和举例，尝试运用数量统计方法和人文地理学理论，力图总揽佛山的历史文化资源，并分析其特点与成因，进而评估其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

（一）佛山为岭南衣冠之数

封建时代，一地文化之盛，可从科举人才来推定。乡贡进士是封建社会基本的文化和统治人才。一地乡贡进士数量的多寡，决定了该地在区域政治中的地位。为此，本文根据《广州府志·选举表》，制定《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地域分布简表》，以了解佛山在广府文化中的地位。

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地域分布简表

地区	唐	宋	元	明	清	小计	比例%
番禺	7	76	11	93	73	260	20.3
南海	10	96	6	146	99	357	27.8
顺德		20	7	99	112	238	18.6
三水		13		4	12	29	2.2
高明				1		1	0.1
东莞	1	65		81	46	193	15.0
新会		3	3	45	34	85	6.6
从化		1		4	2	7	0.5
增城		10	1	10	5	26	2.0
新安				1	7	8	0.6
香山		7	3	15	27	52	4.1
花县		2	3		4	9	0.7
新宁					3	3	0.2
龙门		7	1		1	9	0.7
清远				4	1	5	0.4
始兴		1				1	0.1
总计	18	301	35	503	426	1283	100

从上表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信息：

（1）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总人数为1283人，其中番禺为260人，占20.3%，南海357人，占27.8%，顺德238人，占18.6%，东莞193人，占15.0%。佛山所辖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四县历代的乡贡和进士人数占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总数的48.7%，几占半壁江山。

（2）佛山区域人才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南海所提供的乡贡、进士人数居第一，占广州府总人数的27.8%。显然是佛山、乃至广府地区的文化中心地带。晋代郭璞称：“南海盛衣冠之气”。清代吴荣光也指出：“国朝制科，广东九郡举人中额七

十有二名，每科广州郡儿居其半，广州十四属，南海又居其半。”[]卷一 顺德占18.6%，论比例似乎逊于南海，但是明代以来顺德从南海分离、单独置县后，文化崛起的速度是惊人的，尤其是清代，其进士人数竟然超越了南海、番禺而跃居第一。相比之下，三水仅占2.0%，高明仅占0.1%，这与它们建县较晚、开发较迟有关。《高明县志·列传序》曰：“高明本广肇错壤，半山半泽，风气朴茂，自画疆开县曾不数十年，而人才继起，德行文学载在通志、郡志者不一书。”[]高明进入选举的人数，历代仅有一人，因此县志编纂者只好强调记载在《广东通志》中的德行、文学之士，其文化相对落后是不争的事实。

佛山历代乡贡进士人数在广东居于前列，直接决定了佛山状元数在全省也是独占鳌头。这一点可以从《广东历代状元、榜眼、探花分布简表》中看出。

广东历代状元、榜眼、探花分布简表

地区	状元		榜眼		探花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广州（番禺）	1	11.1	1	12.5	3	33.33
佛山（南海、顺德）	5	55.6	3	37.5	3	33.33
潮州	1	11.1				
封川	1	11.1				
吴川	1	11.1				
海阳			1	12.5	1	11.11
东莞			1	12.5	1	11.11
清远			1	12.5		
定安					1	11.11
汉军旗广东驻防			1	12.5		
合计	9	100	8	100	9	100

广东历代状元远远有9人、榜眼8人、探花9人，佛山在这个排行榜中无论是状元、榜眼还是探花，数量均是第一，所占比重也有三分之一多，佛山因而赢得了“状元之乡”的美誉。其中佛山澜石黎涌一村就先后出了简文会、伦文叙两位状元，伦氏家族更是父子四人连中四元，成为名副其实的状元村。这与其面提到佛山历代乡贡进士人数在广州府，乃至整个岭南居于前列是息息相关的。在封建社会，状元有特殊的品牌效应，佛山状元为提升佛山的文化名城地位作出了特殊贡献。

就人才质量而言，佛山历代涌现了方方面面的人才，成为了岭南文化名人的渊藪。在经学方面，佛山自明清以来出现了方献夫、郑毓、庞嵩、区大伦、何维柏、曾钊、桂文灿、温汝能、简朝亮等人，或通一经，或兼通数经，皆为岭南著名经学家。史学方面，周克明、黄衷、邝露、梁廷枏、李文田、汪兆铭等人，皆学有专攻，自成名家。文学方面，佛山所拥有的著名文学家人数明清两代均居全省第一。据统计，明代广东省有著名文学家41人，广州府33人，其中南海县10人、顺德6人；清代广东省著名文学家68人，其中广州府48人，其中南海13人、顺德11人。[]在这些著名文学家中，明代初期南园前五先生开岭南诗派，五子中佛山人居其二，顺德孙贲被誉为“岭南诗宗”；明代中叶，南园后五先生继起，引领粤海诗坛，其中顺德欧大任、梁有誉影响遍及全国。明末清初，“南园十二子”中佛山人居一半；顺德陈邦彦与南海陈子壮、东莞张家玉并称“岭南三忠”；陈邦彦之子陈恭尹与番禺黎遂球、南海邝露并称“岭南前三家”。清中叶，顺德黎简与同县张锦芳、黄丹书、番禺吕坚因擅画被誉为“岭南四家”；顺德胡亦常、张锦芳与钦州冯敏昌因善诗并称“岭南三子”。晚清至近代顺德黄节与番禺梁鼎芬、曾习经、罗瘦公以诗文并称为“岭南近代四家”；吴趸人开近代谴责小说之先河，康有为成“诗界革命”之代表……。2007年广州市越秀区建成南粤先贤馆，首批入馆56位对岭南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南粤先贤，佛山入选10人，占17.8%，居各地之首。这也说明了佛山在岭南文化的地位。康熙《南海县志》云：“广郡称海滨邹鲁，而南邑为首，衣冠文献甲于中州。邑中大魁蝉联，名脚鼎峙，殆衣冠之数也。”

佛山之所以能够成为“衣冠之藪”，取决于佛山教育的发达和对文化的重视。佛山各地村里多社学，而各乡则多书院，担负教育功能。《广州府志》卷十五云：“粤中文会极盛，乡村俱有社学文会，即集社学中英才以及童子，胜衣擗管，必率以至，不敢规避。”又特加按语指出：“近日祖祠及各乡书院皆有文会。祖祠月有定期，书院则联数乡或十余乡轮流值会，八股外，间及古学，广属文风差胜，职此之由。而南海、顺德、香山尤盛。”[]

上述佛山历史文化名人，“风节可仰而思也，德业可考而法也，论议可诵而服也，……后贤继兴，将亦藉声光以自壮矣。表南海者着，其在于兹。”[]他们生于佛山、长于佛山，建设佛山，奠定了佛山在广府文化中的中心地位，是佛山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名片”，也是佛山“文化名城”建设的文化资源。例如，我们今天讨论佛山人精神，佛山历史文化名人身上的风节德业，治学精神、重文传统，完全可以成为其重要内涵。

（二）佛山为岭南文献之邦

我们判定一地文化的地位，当地所遗留的文献典籍的多寡，当时重要依据之一。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云：“若汉之时，吾粤文始于西，为陈钦、陈元父子。唐之时，吾粤文始于北，为张文献（九龄）与君（刘軻）。文献与君，其又为粤北之终而南之始者也。”[]汉唐时期，岭南文献中心分别在粤西之广信（封开）和粤北曲江（韶关）；至唐宋以来，以番禺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迅速崛起，成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献也随之累计发展，逐渐成为岭南的文献中心。

罗志欢先生曾制《岭南作者及文献分布简表》，目的在于反映岭南文献分布，我们借此以观察佛山地区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

岭南作者及文献分布简表[]

地区	作者							著述							
	汉	唐	五代	宋	元	明	清	小计	比例%	经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小计	比例%
广州	1	1	9		45	88	144	21	59	102	70	223	454	22	
佛山	1			6	3	128	120	258	37	78	122	61	331	29	
韶关	1	7	2	14		10	8	42	6	9	116	16	27	168	8
惠阳		1		14	4	51	14	84	12	39	103	69	127	338	16
梅县				2		9	24	35	5	14	42	3	24	83	4
潮汕		1		4		31	11	47	7	23	65	15	61	164	8
海南				1		13	4	18	3	12	52	5	27	96	5
湛江	1	1			1	12	27	42	6	6	64	4	15	89	4

肇庆	1	1	5	15	22	3	8	50	8	22	88	4			
合计	4	12	3	51	8	304	310	692	100	248	716	251	857	2072	100

根据此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自汉至清，佛山有作者258人，占总人数692人中的37%，高出广州的21%；惠阳的12%；佛山历代见于著录的经史子集四部著述592种，占29%，高于广州的22%、惠阳的16%。无论是作者人数，还是著述数量，佛山都是毫无争议的第一，佛山在岭南文化中的中心地位，由此可以见出。

2. 从佛山文献遗存的类别来看，经、史、集部文献数量均居岭南第一。就各部在所占比例而言，经部占佛山总文献数量的13%，史部21%，集部56%，子部占10%。由此可见，佛山文化中文学与史学尤为发达。

3. 从历代作者分布的朝代来看，佛山自明清时期才成为岭南的文献中心。明清两代，佛山共有作者248人，占佛山历代总人数96%，占岭南作者总人数的35%。由此可以推出，佛山文化的崛起时期是明清两代。

4. 佛山历代的文献遗存中，史部文献数量较为可观，其中地方志的数量所占比重最大。据统计，佛山地区历代地方志著录43种，现存58种，现存数量在整个岭南地区居第一，著录数量居第二。[8]316地方志是记录一定行政区域自然和社会风貌、历史与现实材料、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综合性文献。因此，地方志的制作与保存，实际是对地域文化的一种自觉构建。一个地域的人们基于某种文化认同——种姓、方言、风土、产业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和荣誉感，出于对地域文化共同体的历史求知欲，会有意识地运用一些手段来构建和描写传统，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历史编纂，因为“历史编纂的任务是确立和完善关于过去的形象。批判的或科学的历史编纂所探究的，是已为人们所接受的、或是传统的过去之形象，并且对他们进行考证和加以完善。”[]这从清代中叶著名史学家顺德人梁廷相相对广东地方史志的研究可以得到验证。梁廷相曾著有《顺德县志》、《南越五主传》、《南汉书》、《广东海防汇览》、《粤秀书院志》等一批地方史志。在这些著作中，他一方面通过精细的史料考证，试图准确再现地方历史，另一方面则结合自身对于岭南文化的体认，自觉参与对广东文化特质的构建。如《南越五主传》记南越政权的开创者汉人赵佗“和集百越”[]、北通中原；《南汉书》中，记梁宗父子“所招应多中朝名士”[]，提升了岭南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水平。这实际上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梁廷相在刻意凸显岭南文化的兼容性特质，这种著述行为，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构建。[]

佛山成为典籍之乡，以佛山人才兴盛为内因，而人才兴盛则得益于经济的发达。叶石洞云：“东广好辞，缙绅先生解组归，不问家人、生产、惟赋诗、修岁时之会，粤人故多高致乃尔。”[7]卷十二正是因为广东富饶的地方经济，可以解决退休士大夫生活之忧，故可以放心进行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佛山成为岭南文献之邦的直接原因则在于佛山印书刻字业的发达。佛山古代的书籍行，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技术先进。《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书籍行”条载：“从前用木板印刷，近多用点石或铅字排印，行销内地西北南洋群岛，印刷、摺叠，需人颇多，盛时不下千人，云现大小二十余家。”“刻字行”条载：“业此者多在水巷及豆豉巷大地街，其设摊店前以豆豉巷为最多，刻工沿巧。”[1]卷六金玉祥《粟香三笔》卷四指出：“广东刻工，在顺德县之马冈。均以书板多者为富，嫁女常以书板为奁资。”[]咸丰《顺德县志·舆地略》也记载：“今马冈镂刻书板，几遍艺林，妇孺皆能为之。男子但依墨迹刻界画线，余并女工，故值廉而行远。”[]卷三正是因为有便利的刻书条件，咸丰《顺德县志·艺文略》才可以自信宣称：“吾顺本南海离明地，夙号人文渊藪。大手著作，卓有可观，自来俗尚声诗，操觚家既不可数计，而悠游林下者，往往假吟咏以自娱，故诗集之饒，几等南渡兰亭。”[14]卷十七出版业的发达，使佛山相对其它地区更有条件保存、汇集文献，故而成为岭南文献之邦。而经济的发达，则使士人有条件悠游艺林，故佛山典籍中多文史之作。

（三）佛山为岭南风情之乡

一地文化之盛，不仅表现在以名人和典籍为表征的精英文化上，而且也表现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载体的民间大众文化上。

佛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当丰富的。目前，佛山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3项，市级名录47项；8位国家级传承人，21位省级传承人，61位市级传承人，数量居广东省第一。佛山还先后获得“秋色艺术之乡”、“粤剧曲艺之乡”、“陶瓷艺术之乡”、“武术之乡”等17个国家级和省级民族文化艺术称号。佛山因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岭南风情之乡。

佛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佛山的城市变迁和城市特质。佛山的1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为粤剧、石湾公仔、狮舞、剪纸、木版年画、龙舟说唱等、佛山狮头、香云纱染整技艺、佛山祖庙庙会、佛山十番、人龙舞、佛山彩灯、佛山秋色，多数为手工业项目，与农业文明直接相关的项目较少，绝大部分为工商业文明的结晶。这与明清以来佛山由农业聚落转变为工商巨镇的社会转型有关。例如，顺德“香云纱”，俗称“蓼纱绸”，是目前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真丝绸面料。它主要利用植物蓼莪茎块的液汁多次喷涂于练熟的坯绸上，使织物相聚一层黄棕色的胶状物质，再经过过河泥、摊雾等工序，反复多次晒、水洗后使胶状物变成黑色而成。香云纱因制作精良，曾价比黄金，被称为“软黄金”。顺德人之所以能够发明如此精细高超的织布技艺，则与佛山桑基鱼塘的生产方式和纺织业的兴旺发达不无关系。宋元期间，珠江三角洲的劳动人民，巧妙地利用地形、河床等自然条件，针对不同的地貌特点，将一些堤围修成堤的形式，并联筑成大围，采用人工措施促淤，加速了沙坦的淤涨，创造了名副其实的沧海桑田的奇迹。明代江南移民还带来了一种高效的农业生产方式——桑（果、蔗）基鱼塘，即把桑、蚕、鱼三者结合在一起，鱼塘养育、基上种蚕、桑叶养蚕、蚕粪下塘喂鱼，塘泥上基肥桑。蚕桑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丝织业的发展。蚕桑业发展相应也带动了染色行、复染行、浆纴行等行业和蚕丝出口贸易的发展。佛山丝织业在清初发展为十八行，即八丝纴行、什色纴行、元青纴行、花局纴行、宁绸行、蟒纴行、牛郎纱行、绸纴行、帽纴行、花纴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洋纴行等，香云纱染整技艺就是在岭南的自然物产和历史悠久的工商业文化中孕育出的奇葩。

佛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体现了佛山人的智慧智慧和佛山的生产文化特点。比如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湾公仔，就与佛山陶瓷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佛山陶瓷业的历史，最远可追溯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晚期。在佛山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河宕遗址，是目前全省新石器晚期遗址中经明确鉴定使用轮制技术的一处。东晋时，广州刺史陶侃曾“导民制瓦”，中原陶瓷技术南传，陶瓷业进一步发展，至唐代已经初具规模。明清以来，石湾陶瓷业发展更快，获得了“石湾瓦，甲天下”的美名，所制产品涵括日用、美术、建筑、手工业、丧葬五大类，产品在千种以上。石湾公仔就是在日用陶高度发展，商业流通活跃繁荣的基础上，适应岭南人们的审美需要而产生的，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陶艺史上的一朵奇葩。此外，佛山秋色、狮头制作，甚至包括剪纸和木版年画，则与佛山印染业的发达不无关系。

佛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佛山人精神世界的生动载体。如佛山祖庙北帝诞庙会，便集中体现了岭南民俗的特点。《佛山忠义乡志》中有：“灵应祠神诞，乡人赴祠肃拜，各坊结彩、演剧，曰重三会。鼓吹数十部，喧腾十余里。”记载的就是北帝诞庆典期间的热闹情景。北帝崇拜首先与南越巫风之盛有关。《汉书·郊祀志》：“粤人俗鬼，而其祀皆见鬼，数有效。”其次，北帝崇拜形成与岭南地域环境有关。广东多水乡，常常有水患，而北帝为水神，所以广东沿海及珠江三角洲地

区民间多信奉北帝，以祈求风调雨顺。而北帝巡游中的出现的祈福仪式，则与多佛山人多以工商为业有关。因为工商业者财产聚散无形，因而很容易滋生一种不安全感，故而一方面转向神灵寻求保佑，另一方面则形成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理，消费一直较为发达。而北帝巡游中的烧大爆也是佛山的特色民俗之一。《佛山忠义乡志》载：“正月、元旦、拜年，烧炮竹比他处为盛，自除夕黄昏，轰响达旦，其声远近大小，参差起伏，静听之历历快意”。这与佛山在明清时是我国重要炮竹生产基地之一有着密切关系。佛山制造烟花炮竹，“多由本乡及附近四乡承造，按期寄回发售。惟炮引购自肇庆，销行四乡及港澳、南洋等处，大者数家，小者二十余家。”而炮竹之所以成为佛山的重要手工业之一，则与当地崇尚神佛先祖，祭祀庆典较多有关。

佛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动体现了岭南文化的个性。佛山的1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植根于佛山工商文化的土壤之中，彼此之间紧密相连、互相依赖。例如，著名的佛山秋色，最初是佛山人们在秋季丰收之后，用手工业生产边角废料和小商贩剩余下料，制作各种手工艺品参加游行，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秋色赛会。佛山秋色的游行，以铺为单位，或举旗、或提灯、或耍狮、获进行杂技、武术表演等，酬谢神明，差不多汇集了佛山主要的民间艺术形式，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民间艺术展。再比如佛山粤剧，在音乐上广泛吸收了广东音乐、民间说唱，在装扮上则吸收了广绣、牙雕、陶瓷、灰塑等地方艺术形式，是一种典型的综合艺术。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动体现了岭南文化诸如兼容、开放和务实等个性。

（四）佛山为岭南辐辏之地

佛山之所以能够成岭南衣冠之薮、文献之邦、风情之乡，与其在交通与经济方面作为岭南辐辏之地的地位息息相关。

佛山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佛山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东倚广州，西接肇庆，南连珠海，北通清远，毗邻港澳，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可以看作是广东各地的辐辏之地，为广东地理之“聚”。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佛山乃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江西、广西数省进入广州的门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交通环境和气候条件，使佛山物产丰富，贸易发达，成为物资与人员的聚散之地。唐宋年间佛山的手工业、商业和文化已十分繁荣，至明清时更是发展成商贸云集、工商业发达的岭南重镇，与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和河南的朱仙镇并称中国的“四大名镇”，曾为中国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商贸重镇，被列为全国“四大聚”（北京、佛山、苏州、汉口）之一。

佛山的地理交通位置之“聚”，使之成为了物资之聚、人才之聚，成了多元文化交融汇合的地带，从而也成为了岭南的人文渊薮、文献之邦、风情之乡。《广州府志》曾指出：“其民多秀而文，其服食吊问与中州无甚相远。求其故，盖其地富与巨海相接，鱼盐之利，水陆之产，珍物奇宝，非他郡所及。士大夫或以宦游，或以商贸，流寓其间，往往乐而忘返，而子孙遂为编氓。岁月已久，尚能守其旧而不失。无怪其习俗之变革，而椎鲁之移易也。”[5]卷十五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也称：“佛山，岭南一巨镇也。……不特商贸辐辏，货物甲于东南。且人物之盛，名贤巨公相继而起，又岂徒科甲文卷跨于各乡已哉。”[6]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佛山汇集各方物资、人员的“聚”，其实是一种文化的聚。这种“聚”，造就了佛山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康熙《南海县志·人物列传序》曾不无自豪的总结：“南惟时都会，十郡辐辏，岭海灵气于滋郁蟠，故其上下古今，千有余年，发为人文，实冠全粤。或以勋名传竹帛；或以著述流休美；而且殉节封疆；而且高蹈岩穴；下至笄裙閨媛，亦砥砺捐躯，与丈夫等烈。煌煌细帙，不啻盛矣。”[7]卷十一温汝能论《羊城古钞序》顺德云：“顺邑处羊城西南，境接南、番、香、新之交，无地非水，所居山庄村舍，悉水绕其旁，而舟楫往来随潮上下，一望而波光四合，景物超然。故其人士多潇洒出尘，能文章，工吟咏，而其所著见亦无涯无尽，一寓其汪洋浩瀚之势，论者谓地之灵有以钟之也。”[8]可以说，佛山文化之发达，取决于佛山的地域环境、地理、交通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

如果说佛山历史名人是佛山文化的“纪念碑”，佛山所遗留的文化典籍是建筑这座纪念碑的“沙石”，而佛山的民俗文化则是纪念碑脚下的“泥土”。佛山今天要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就挖掘资源而言当从历史文化名人研究和文献整理、民俗文化研究入手，就现实发展而言，则取决于以文化教育、交通和文化产业发展为基础的经济振兴。

作者简介：陈恩维（1975—），男，湖南汨罗人，文学博士，博士后，副教授，主要从事岭南文学和文化研究。

注释：

- [1]冼宝干总纂.佛山忠义乡志[M].民国十五年（1926）刻本.
- [2]郑梦玉等修.南海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五十六年.
- [3]邹兆麟修、蔡恩达等纂.高明县志[M].光绪二十一年刊本.
- [4]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43-156.
- [5]瑞麟、戴肇辰等修.广州府志[M].光绪五年刊本.
- [6]姚泳.广州人物传序[A].广州人物传[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
- [7]屈大均.广东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322.
- [8]罗志欢.岭南历史文献[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18.
- [9]E.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73.
- [10]梁廷柟著，杨伟群校点.南越五主传及其它七种[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5.
- [11]梁廷柟著，林梓宗校点.南汉书[M].北京：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1.
- [12]陈恩维.梁廷柟评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4-95.
- [13]金武祥.粟香三笔[M].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59.
- [14]郭汝成修，冯奉初等纂.顺德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五十六年.
- [15]吴荣光.佛山忠义乡志[M].道光十年(1830)刻本.
- [16]（康熙）南海县志[M].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 [17]仇巨川纂，陈宪猷校注.羊城古钞[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2.